

# 红旗

HONGQI

一九六二年 13



# 红旗

半月刊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办

★ 一九六二年第十三期 ★

## 目 录

加速采掘工业的发展 .....薄一波 (1)

“人民资本主义”的反动本质 .....黄范章 (11)

资产阶级议会民主的虚伪性 .....张友渔 (20)

新的“挑战”和新的“选择”.....向 阳 (28)

利害篇 .....关 锋 (32)

艺术风格的独特性和多样性 .....冯其庸 (34)

——文艺随笔

☆ 七月一日出版 ☆



# 加速采掘工业的发展

薄 一 波

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证明了：国民经济的发展，必须以农业为基础。国民经济各部门，尤其是工业各部门，决不可能脱离农业这个基础，而孤立地存在和发展。农业能够提供多少商品粮食、副食品和工业原料，能够提供多少劳动力，能够提供多少购买力，无论对于轻工业的发展或者重工业的发展，都起着首要的决定性的作用。以农业为基础，这是有关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全局的根本问题。一切隶属于全局的局部问题，只有在正确处理全局问题的条件下，才能够得到比较顺利的解决。指导工业建设必须具有这种全局观点。

正确地安排农业、轻工业和重工业之间的比例关系，并且正确地安排重工业和轻工业内部的各个行业、各个环节之间的比例关系，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本文仅就重工业内部采掘工业和加工工业的关系以及如何加速采掘工业的发展问题，作些探讨。

重工业包括采掘工业和加工工业两个部门。在这两个部门发展的相互关系上，加工工业的发展，又是以采掘工业的发展为基础的。采掘工业直接为冶炼工业、化学工业等提供原料，并且为国民经济各部门提供燃料。采掘工业所提供的原料、燃料愈多，冶炼、化学等工业就能够愈快地得到发展，从而机械工业和其他加工工业也就可以愈快地得到发展。反之，如果采掘工业发展得慢，加工工业的发展也就决不可能快。这是重工业发展过程中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

对于采掘工业在现代工业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马克思曾经说过：“铁和煤是近代工业的大杠杆，我们无论怎样重视这种改良（按：这里是指采用先进技术）的意义，都不算过分。”<sup>①</sup>

<sup>①</sup> 《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783页。



列宁在《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的报告中，谈到俄罗斯拥有丰富的铁矿石、矿物燃料、森林、水力、化学工业原料的资源以后，接着说到：“用最新技术来开采这些天然富源，就能造成生产力空前发展的基础。”<sup>①</sup> 列宁并且根据对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的总结，指出：“生产资料增长最快这个规律的全部意义和作用就在于：机器劳动的代替手工劳动（一般指机器工业时代的技术进步）要求加紧发展煤、铁这种真正‘制造生产资料的生产资料’生产。”<sup>②</sup> 这个结论，不仅为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所证明，而且也已经为社会主义国家的建设经验所证明。

在我国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党和政府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使采掘工业得到了迅速的恢复和发展；在第一个和第二个五年计划时期，都把大力发展采掘工业摆到社会主义工业化的重要位置上。在刘少奇同志代表党中央向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所作的政治报告中，曾经强调指出，必须增多煤炭、石油、有色金属工业等采掘工业的生产，以加速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由于党和政府的重视，十二年来，特别是最近几年以来，采掘工业得到了很大的发展，有力地促进了社会主义工业化事业。但是，在发展过程中，在重工业内部采掘工业同加工工业之间，也出现了新的不平衡。采掘工业特别是有色金属、煤炭、石油等工业的生产，在当前重工业生产中，成为一个突出的薄弱环节。在采掘工业各个行业内的某些生产环节之间，也出现了不尽适应的情况。这种不平衡，有些是在大发展中不可避免要出现的；有些是在具体工作中主观安排不符合客观情况而形成的。毛泽东同志早在一九五七年《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报告中说过：“在客观上将会长期存在的社会生产和社会需要之间的矛盾，就需要人们时常经过国家计划去调节。我们每年作一次经济计划，安排积累和消费的适当比例，求得生产和需要之间的平衡。所谓平衡，就是矛盾的暂时的相对的统一。过了一年，就整个说来，这种平衡就被矛盾的斗争所打破了，这种统一就变化了，平衡成为不平衡，统一成为不统一，又需要作第二年的平衡和统一。这就是我们计划经济的优越性。事实上，每月每季都在局部地打破这种平衡和统一，需要作出局部的调整。有时因为主观安排不符合客观情况，发生矛盾，破坏平衡，这就叫犯错误。矛盾不断出现，又不断解决，就是事物发展的辩证规律。”<sup>③</sup>

我们应当遵照毛泽东同志的指示，在已经取得的伟大成绩的基础上，在工业发展的新的水平上，求得重工业内部新的平衡。要做到这样，关键在于根据新的比例关系的要求，集中必要的力量，加强采掘工业，使采掘工业得到优先发展，使采掘工业和加工工业的关系进一

① 《列宁全集》第27卷，人民出版社版，第235页。

② 《列宁全集》第1卷，第88页。

③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2页。



步地協調起來，使采掘工業內部的各生產環節之間的比例關係更好地適應起來。

## 二

采掘工業必須得到優先發展，這是重工業發展的客觀要求，是由采掘工業的特點所決定的。要加強采掘工業，使采掘工業得到優先發展，必須正確地認識和掌握采掘工業的特點。

采掘工業同加工工業比較起來有些什麼不同的特點呢？

第一，加工工業的勞動對象，即生產所用的原料、材料，都是其他工業部門生產的成品，都是可以移動的；而采掘工業的勞動對象，如馬克思所說：“不是過去勞動的生產物，……都是自然不要報酬賜予的”<sup>①</sup>，都是固定的，不能移動的。由於這樣，采掘工業只能就那種固定的勞動對象，經常地移動機器設備和其他設施來進行生產，而不能像加工工業那樣，可以有計劃地調動勞動對象來進行生產。加工工業的工作場所，可以經常保持穩定；就一個加工工業企業來說，它的勞動手段經過不斷更新，勞動力經過調整、補充，原料、材料經過有計劃的供應，生產能力一般地是不會降低，而是不斷增長的。而采掘工業則不同，它受礦產資源的分布、生成狀態和儲量的限制，在一個礦井、礦區內，礦產資源開采一點，就減少一點，開采完一個地區，就必須轉移到另一個新的地區去開采，不然，即使有足夠的設備和工人，也發揮不了作用，生產將發生中斷。因此，要保持采掘工業生產的穩定性，就需要事先不斷地準備好新的礦產資源和開辟出新的工作場所。

第二，加工工業一般地是在地上進行生產，而采掘工業一般地是在地下進行生產。采掘工業工人在地下作業，經常要同水、火、瓦斯、地層壓力、煤塵、岩塵等不利的自然條件作鬥爭，而且勞動比較繁重，體力消耗較大。一般地說，采掘工人的勞動條件不如加工工業工人的好。同時，采掘工業企業所占的勞動力又往往要比加工工業多得多。因此，在采掘工業企業里，尤其需要注意保證安全生產，鞏固井下工人隊伍，並且不斷地提高技術裝備水平和機械化程度，減輕笨重體力勞動，提高勞動生產率。

第三，采掘工業的礦產資源一般是深藏在地下，要找到它，弄清它的儲量、品位和生成狀態，要弄清它的地質條件，要確定開采的方法和建設的規模，都要經過詳細的勘探工作。而且由於許多礦產資源往往蘊藏在山區，要在這些地區建設采掘工業企業，常常還要興修鐵路、公路和電站。這種情況同建設加工工業有很大的不同。因此，建設采掘工業企業比建設加工工業企業往往需要更多的投資，需要多用一兩倍或者更長的時間，需要克服更多的困

<sup>①</sup> 《資本論》第1卷，第757頁。



难。而且采掘工业企业投入生产以后，达到设计生产能力的時間，比起加工工业企业要慢得多。

第四，加工工业企业，一般地只是在扩大再生产的时候，需要进行基本建设，而采掘工业企业不但在扩大再生产的时候，需要进行基本建设，就是在简单再生产的过程中，也需要经常进行基本建设，如完成掘进（剥离）工程，而且这种工程量是很大的。

第五，加工工业企业的生产过程，对于它的劳动对象来说，主要是物的形变和质变；而在采掘工业企业，主要是物体的采掘和转移，而且是笨重物体的大量转移，动辄有千百万吨。因此，运输在采掘工业企业的生产过程中，是一个基本的环节，它的地位比在加工工业企业中重要得多。脱离开搬运，采掘工业的生产过程就不可能完成。采出的矿石、煤炭如果不能搬运出来，生产就无法继续进行，它的使用价值，也就不可能实现，加工工业企业也就得不到必要的原料、燃料。同时，采掘工业的生产，由于受自然资源的限制，在地区分布上的不平衡性是比较大的；社会生产对矿产原料、燃料的需要又是经常的、大量的，它们的运输量是很大的，在全国货运总量中，占有很大的比重。因此，发展采掘工业必须充分地考虑矿区内部的和矿区外部的运输条件，注意运输的经济合理性。

采掘工业的这些特点，决定了它的发展要比加工工业的发展受着更多的限制，需要更多的条件、资金和时间。我们在安排采掘工业生产和建设的时候，必须充分地注意到它的这些特点，既要考虑到需要，又必须考虑到自然资源、建设力量等方面的可能；既要考虑到当前的需要，又要考虑到长远的发展；既要考虑到采掘工业本身的条件，又必须考虑到整个工业合理布局的要求。

采掘工业和加工工业在发展中必须保持互相适应的比例关系。由于采掘工业是加工工业的基础，而且加工工业本身的发展相对地比采掘工业容易一些，因此，在经过综合平衡、保持正常比例的范围内，应当加快采掘工业的发展，使采掘工业的生产能力更富裕一些，就是说，使它留有适当的余地，以便为加工工业的发展创造更为雄厚、可靠的物质基础。这样做，对于加工工业的发展，以至对于整个社会的生产都是有好处的，它可以提供充分的基本原料、燃料后备和储备，而这是保证社会再生产的正常进行和防备意外事故所完全必需的。正如马克思曾经指出的：在资本主义的社会形态废止以后，社会再生产“一方面必须有一定量的固定资本，比直接需要的更多；另一方面，并且特别是原料等物品的储存，也要比直接的常年的需要更大。（这一点，对于生活资料方面说，是尤其适合的。）这种过剩生产，等于是社会对它自己的再生产所需各种物质资料的控制器。”<sup>①</sup>

<sup>①</sup> 《资本论》第2卷，第586页。



### 三

那么，要加速采掘工业的发展，使采掘工业的发展适应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的需要，首先是在重工业内部适应加工工业发展的需要，应当解决哪几个主要问题呢？

第一，保证采掘工业现有的生产能力不断地得到补充。

采掘工业企业的生产过程，就其基本工序来说，是采矿、掘进（剥离）、搬运相结合的过程，也就是从生产准备到生产，又从生产到新的生产准备的反复循环和交错进行的过程。

任何工业企业在进行生产之前，都需要作好生产准备工作。由于采掘工业的特点，掘进（剥离）是采掘工业特有的、主要的生产准备工作。掘进（剥离）不但为采矿创造条件，而且为搬运采出的矿石、煤炭创造条件。前面说过，采掘工业的劳动对象是固定在一定空间范围内的自然资源，工作场所经常移动，一个地区的资源开采完了，就必须转移到另一个地区去开采。这就要求掘进（剥离）一定要走在采矿、搬运的前面，不断地提供采矿的接续工作场所和运输巷道。这种生产准备工作，对于保持采掘工业企业生产的不间断地进行，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固然，任何一种生产，当它失去劳动对象的时候，都无法维持。但是，就一个加工工业企业来说，当原料、材料和燃料不足的时候，还可以在企业之间相互调剂使用，或者动用国家的储备；当它的运输发生故障的时候，也比较容易解决。而采掘工业企业当矿产资源、工作场所接替不上，运输巷道阻塞的时候，便没有调剂或者周旋的余地，就只能中断生产。

在采掘工业企业中，采矿和搬运以掘进（剥离）为条件，掘进（剥离）服务于采矿和搬运。采矿、搬运和掘进（剥离）是统一在一个完整的生产过程之中的，但是它们之间又是矛盾的。由于这几个基本工序同在一个矿井（区）内进行，在时间的安排上，在人员、设备、材料的分配上，在运输巷道的利用上，往往互相有所牵扯。因此，需要根据它们在客观上存在着的一定的比例关系，来组织生产。如果违背相互的比例关系，只抓任何一个环节，必将造成采矿、搬运和掘进（剥离）不相适应，这对生产的发展是不利的。在这个问题上，主要地应当防止只顾一时增加产量，把人力、设备过多地抽调到采矿方面来，而挤掉掘进（剥离）工作的偏向，那样做，虽然可能一时把产量突击上去，但是，掘进（剥离）量少了，准备开采的矿量不足，却将给以后的生产造成困难，使生产下降，甚至可能使资源受到破坏。因此，这种办法是不足取的。

为了保证生产持续地正常地进行，一切矿山都应当切实做好生产准备工作。拿一个煤矿来说，在采完这一段煤层（水平）的前几年，就要准备下一段煤层（水平）；在开采现有采区









床有大有小，矿层有深有浅，矿质有富有贫，在交通条件方面也各不相同。而且采掘工业的建设所需的资金、设备、材料较多，国家在一定时期用于矿山建设的物质技术条件又有一定的限度。因此，在采掘工业企业的建设规模上，应当根据矿产资源的状况和当前人力、物力、财力的具体条件，作全面的经济比较，按照经济合理的原则，加以确定，该大就大，不该大的就搞中型或者小型的，不宜强求一律，或者主观地规定大、中、小型的比例。也不应当分散建设，把战线拉得很长，而应当根据投资和材料、设备供应的可能性，选择开发条件最好的矿区、矿井，分期分批地进行建设，以便充分地发挥投资效果。

在矿山建设过程中，应当严格注意保证工程质量，切实做到按期、按质地交付生产。那种“简易投产”，降低工程质量，或者不适当地削减必要的单项工程的做法，是不正确的。对于一部分没有按规定的质量标准移交生产的矿山建设工程，应当根据可能的条件，首先使各项工程搭配成套。拿煤矿来说，应当有计划地使提升、运输、排水、通风等生产系统，和井巷开拓等项工程，尽快地达到矿井的设计水平；同时，还应当有计划地进行矿区范围的各项工程的填平补齐工作，使装卸、洗选、机修能力同原煤的生产能力相适应，以便充分地发挥矿井的生产能力。在有色金属、黑色金属矿山，同样应当注意解决类似的问题。在某些采掘工业企业，适应新增生产能力的需要，还应当相应地解决矿区外部铁路运输和电力供应等问题。在进行这些建设的时候，也都应当注意防止资金、物资的分散使用。

在新建、扩建、改建矿山的时候，还有一个问题需要解决，这就是，一个矿区资源的蕴藏量，究竟用多少年代把它采完最为合理，也就是说，一个矿区每年的生产能力定成多大、服务年限定为多长，才最为合理。一个矿区的矿产蕴藏量同开采能力之间是存在一定的比例关系的，这种比例关系，也就是我们经常所说的“开发强度”。

对于采掘工业企业来说，怎样的开发强度才是最合理的呢？最重要的是要符合以下的要求：（1）充分地合理地利用矿产资源；（2）基本建设投资最低；（3）劳动生产率最高；（4）生产成本最低；（5）更好地为矿区附近的冶金、化工等企业服务，更好地适应国民经济当前和长远发展的需要。几年来有些采掘工业企业，采用先进的、合理的开采方法，适当地提高了开发强度，取得了较好的经济效果。但是，也有的采掘工业企业，超过了合理的开发强度，用多打井，多增设备，多添人的办法，来提高开采能力，并且采取错误的开采方法，只采厚层矿，不采薄层矿，只采品位高的矿，不采品位低的矿，这样做，虽然一时产量有所增加，但是，却降低了回采率，严重浪费了资源，过多地增加了投资，浪费了人力、物力，甚至造成生产下降，结果加大了企业的生产成本，减少了社会主义的积累；而且有可能同附近的冶金、化工等加工工业企业的发展脱节，甚至使它所服务的加工工业企业，提前失去原料基地。显然，用这样的方法，并不能真正有效地达到多快好省的目的。因此，每个矿区都应当





远程运输来供应，既不利于生产，运输业也负担不了。凡是存在这种不合理状况的，必须逐步地改变过来，而且也能够改变过来。我国有丰富的遍布全国的矿产资源，根据统一的计划，完全可以逐步地按照社会主义生产分布的原则，合理地布置采掘工业和加工工业的建设。

为了逐步改变这种状况，一方面，以矿产品为原料、燃料的加工工业企业，特别是冶金、化工、火力电站等企业的建设，要力求接近原料、燃料产地，充分考虑原料、燃料的来源。例如，大型冶金工业企业，就应当靠近金属矿和煤矿来建设，至少要就一头：或者靠近煤矿，或者靠近金属矿。另一方面，在勘探建设采掘工业的地质资源时，要充分考虑地区平衡，特别是要注意在目前缺少煤、铁并且有较好开发条件的地区，积极寻找可供建设新矿区的可靠的自然资源。应当在资源可靠和尽可能接近冶金、化工以及其他工业企业的原则下，有计划、有重点地建设一批矿山或矿井，以保证冶金、化工企业对于各种矿石的需要，以及工业交通部门和当地居民对于燃料的需要，并且为采掘工业同加工工业在长远发展中的更好适应，为运输力量的合理利用，创造必要的条件。

在建设新的采掘工业企业的时候，需要注意不宜使布点过于分散。我国的冶炼、化工等企业主要是现代化的大、中型企业。如果它们的矿产原料、燃料基地分布在许多地方，那么，这种情况显然是同它们的现代化大生产的要求不相适应的。

第五，加强采掘工业企业的技术改造，提高技术装备水平和机械化程度。

采掘工业的生产，由于它本身的特点所决定，耗费劳动量较大，劳动繁重程度较高。因此，无论是采矿，或者是掘进，以至新矿区、新矿井的建设，都要不断地提高技术装备水平和机械化程度，以便不断地提高劳动生产率，不断地减轻繁重的体力劳动。

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当前首要的问题是，要把现有的设备充分利用起来。矿山设备由于在地下同岩石作战，经常移动，并且受潮湿的侵蚀，容易损坏，因此，需要经常地做好设备的维修工作。要教育和训练工人，特别是新工人，经常维护设备；要严格地实行设备的使用、维护的责任制度和计划检修制度；要加强机修的能力，保证必要的检修材料和备品备件，提高检修质量，使设备经常处于良好的状态。

采掘工业企业的技术改造工作，应当有重点、有步骤地进行。一般来说，地质条件较好的（储量多、矿体规则、品位高），应当先改造；地质条件差的（储量少、矿体复杂、品位低）后改造。在进行技术改造的时候，还要考虑到这个矿山外部的交通条件和水电供应的条件；如果这些条件不具备，即使矿山内部技术改造好了，也不能充分发挥效益。就一个采掘工业企业来说，进行技术改造，应当先从加强生产上的薄弱环节着手，提高采矿和运输的机械化、半机械化水平。这样可以在较短的时期内，用较少的投资、材料和设备，增产较多的矿产，提高劳动生产率，并将使工人的劳动条件得到改善。



第六，提高采矿工人的思想觉悟和技术水平，巩固采掘工业的职工队伍。

加速发展采掘工业，必须有一支思想上有觉悟、技术上熟练的队伍。因为生产的条件，是需要人去创造的，技术装备，是需要人去掌握的。同样的生产条件，同样的设备，给政治觉悟高、技术熟练的人去运用，和给政治觉悟低、技术生疏的人去运用，生产的结果是大不一样的。

为了巩固采掘工人的队伍，充分发挥采掘工人的生产积极性和创造性，首先，应当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加强纪律性组织性教育，使采掘企业的每个职工都能够认识到采掘工业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的重要地位和自己肩负的光荣责任，提高对工作的荣誉感、责任心；特别是对于青年工人，更要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帮助他们提高政治觉悟，使他们自觉地遵守劳动纪律，安心于矿山的工作；同时，要在社会上对广大群众加强宣传教育工作，让更多的人认识到采掘工作岗位的光荣，使矿工受到社会的爱戴和尊重。其次，应当改善劳动条件。要建立和健全有关安全生产和劳动保护的规程制度，并且尽一切可能堵塞发生事故的漏洞，彻底消除生产中的隐患，创造安全生产的条件，减少职业病的发生，并且保证必要的劳动保护用品的供应。再次，要作好生活资料的供应工作，逐步解决职工住宅不足的问题；同时，根据按劳分配、多劳多得的原则，改进工资、奖励工作。此外，还要有计划地进行技术训练，使广大工人的技术水平不断提高，使青年工人逐步由技术的生手变为熟手。

在对于采掘工业企业的职工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和技术训练的时候，应当充分发挥老工人的骨干作用、模范作用，因为绝大多数老工人无论在思想觉悟、组织性、纪律性方面，在技术熟练程度方面，都是青年工人应当学习的榜样。同时，应当充分动员技术人员的力量，来帮助工人，特别是青年工人迅速提高技术水平，来不断改进企业的生产技术工作。

\*

\*

\*

加速发展采掘工业，这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客观要求。就目前来说，有计划地加速采掘工业的发展，是贯彻执行党的以调整为中心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方针的一个重要内容。就长远来说，也是我国建立独立的完整的现代化国民经济体系的一个战略性步骤。采掘工业发展了，就可以促进整个重工业的进一步发展，就可以进一步地促进国民经济各部门首先是农业的技术改造，就可以用更多的生产资料支援农业生产，用更多的燃料支援农村和城市，并且将为轻工业、手工业提供它们所需要的设备和工具，特别是提供更多的重工业产品作为原料、材料，来增产日用工业品，节约农产品原料。这样，就可以进一步供应人民生活的需要，活跃市场。工业战线上的全体职工，特别是采掘工业战线上的全体职工，应当鼓足干劲，克服困难，在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指引下，为加速发展采掘工业而奋斗。



# “人民资本主义”的反动本质

· 黄 范 章 ·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在美国，在垄断资本家的带动下，掀起了一种硬把“人民”和“资本主义”这两个不相容的概念捏在一起的“人民资本主义”的叫嚣。一九五六年初，美国政府和美国广告协会还大张旗鼓地举办了专门的展览会，当时的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曾亲临捧场。

“人民资本主义”的中心思想是：现代资本主义“变了”。它的鼓吹者，往往在假惺惺地责难十九世纪资本主义是“贪婪”、“剥削”、“非人道”的制度之后，便竭力宣扬美国资本主义已经或正在通过一个“划时代的革命”，变为一个“民主的”或“人民的”资本主义，说什么这个资本主义不仅与过去“毫无任何相似之处”，而且“远远胜过马克思所梦寐以求的提高全民生活水平的社会主义”。他们把现代资本主义说成在本质上不同于过去的资本主义，宣布美国已经“不用流血和革命而改革了资本主义”，企图以此来否认社会主义革命的必然性。

“人民资本主义”是为日趋没落的垄断资产阶级服务的一种谬论，其内容混杂，众说不一。在它的鼓吹者中间，有的说美国现在

已是“人民资本主义”了，有的则说正处在“过渡”阶段。他们捏造了种种所谓资本主义“革命”，但各人所侧重宣扬的“革命”内容又不尽相同。他们都强调股份公司的“革命”作用，但有的人同时把所谓“国家调节”（尤其是收入分配方面的“调节”）、工会组织的作用也看作是“人民资本主义”的组成部分，有的人则说这些只是“过渡”阶段所需要的。尽管如此，还是可以看出，在美国的所谓“人民资本主义”的喧嚣中，比较突出的论调有“资本民主化论”、“经理制度论”、“收入革命论”这些说法。

所谓“资本民主化论”的鼓吹者宣扬，随着股份公司的普遍推行以及股票在居民中间的广泛推销，似乎在生产集中的过程中，竟相反地发生了资本分散的过程，企业的所有权竟从少数大资本家手中转到了广大人民手中。例如，美国司密斯学院教授萨瓦多里在其著作《自由经济学》中说：“企业愈大，所有权就分散得愈广”。美国钢铁公司董事长布劳也煞有介事地说：“我们企业的所有权已发生了变革，……它们已为千万各式各样的人所占有”。美国布朗迪斯大学教授





馬·勒尔納更把这个情况吹嘘为“所有制革命”。他們企图制造“人民占有”企业的幻觉，来掩盖财政寡头对生产资料的独占。他們还引证了股份公司的所謂“民主制度”（如董事会向股东大会报告工作、“民主”选举等等）来渲染这个幻觉。

此外，他們（如薩尔瓦多里等人）还把参加儲蓄、保險的工人和小生产者都說成是各种企业的“所有者”。理由是銀行、保險公司持有这些企业的股票或債券。

所謂“經理制度論”的鼓吹者宣揚，随着股份公司的发展，在壟断企业里发生了管理职能和资本所有权相“分离”的現象，即企业的管理全权已从資本家手中轉到了一个主要由董事、經理們組成的“新”的“經理階級”手中，并且說这是一次“經理革命”。他們抹煞企业的管理职能完全取决于資本所有权的事实，硬把它們割裂开来，把董事、經理們說成不仅是独立于整个资产階級之外的另一个“階級”（或“阶层”），而且是駕凌于它之上的“权力集团”。例如，美国的資本家兼政客、教授的阿道夫·貝利在其著作《二十世紀的資本主义革命》及《沒有財產的权力》中，就竭力宣揚这个“集团”“沒有財產”，但“拥有支配美国工业經濟的至高的、实际上无可抗衡的权力地位”；而股東們除了有权分紅外，其“权力地位只是一个空中楼阁”，資本家“已經不是一个决定因素”。薩尔瓦多里吹嘘說，这个“經理階級”的出現，是“美国經濟革命的一个方面”。

“經理制度論”者都是壟断組織的忠实卫士，其辯护手法的特点是：承认統治美国經濟的权力集中在一小撮集团手里，但是，他們把这种集中不看成是資本主义制度的产物，而仅仅看作是生产社会化的产物，并且竭力用謊言安撫人心說，掌握这个权力的是一个“嶄新”的“經理階級”，它不是財政寡头的代理人，而是“社会的代表”、“职工的代理人”；它不是靠財產而是靠管理企业的天才、組織才干等获得权力的；它主要关心的不是利潤而是“社会生产”、“人民福利”等等。他們企图借渲染“經理階級”的“权力地位”，来掩盖壟断资产階級对工人階級和其他劳动人民的剝削和統治。

所謂“收入革命論”的鼓吹者宣揚，近一、二十年来，在美国的国民收入的分配中，发生了日益有利于“低收入阶层”（主要是职工和小生产者）的“革命”。这方面最有代表性的著作，是美国资产階級經濟学家庫茲涅茨在一九五三年出版的《高收入阶层在收入和儲蓄中的比重》一书。該书不仅用个人之間的收入分配来掩盖階級之間的收入分配，而且故意給壟断资产階級少算許多收入（如公司的未分配利潤、逃稅和避稅的收入等等），捏造出他們在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有“不断下降”的“趋势”。所有的“人民資本主

• 美国經濟学家維克托·佩洛在其《收入“革命”》（中譯本名《美国各阶层的收入分配》，財政經濟出版社1954年出版）一书中，对庫茲涅茨的这本著作进行了系統的揭發和批判。



义”的鼓吹者，都宣揚美国劳动人民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似乎已經駁倒了“共产党人关于美国资本主义制度下富者愈富、貧者愈貧的宣傳”。近几年来，肯尼迪政府的重要顧問罗斯托的《經濟成长的阶段》、現任美国駐印度大使加耳布莱思的《富裕社会》等书，更是竭力宣揚美国社会的“富裕”，吹嘘它达到了“高額群众消費时代”。

許多人(如薩尔瓦多里、布劳之流)还援引股份資本“分散”的謬論，来宣揚“越来越多”的美国人“都有来自劳动和資本这两个来源的收入”，并胡說这“足以抹平尖銳的階級划分”。此外，所謂国家对收入分配的“調节”、工会組織的經濟斗争等等，也被渲染为促成“收入革命”的因素。总之，“收入革命論”者竭力否认无产阶级贫困化的事实，掩盖現代资本主义制度的剝削实质，抹煞階級对立。

从以上这几种主要謬論来看，“人民資本

主义”的鼓吹者无非是宣揚：通过股份公司的扩大股票发行、管理职能和資本所有权的“分离”，壟断資本企业已經或正在日益为人民所“占有”和“管理”，同时人民也由于获得“資本收入”而日益“富有”。尽管他們中間有許多人都同时強調了其他因素，但几乎一致地都吹嘘股份公司的“革命”作用，把它捧为“革命的工具”、“理想的工具”等等。

美国壟断資本集团还利用“人民資本主义”这块招牌，来扩大股票发行。不少壟断企业(如“美国电话电报公司”、“通用汽車公司”等等)大力发行股票，实行各种利誘企业职工购买企业股票的“計劃”。紐約証券交易所甚至自詡为“人民資本主义的基石”。

“人民資本主义”的論調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在美国出籠之后，西德、奥地利、英国、日本等許多国家的壟断資本集团也都群起鼓吹。他們宣傳的内容虽然有所不同，但其反社会主义、反人民的目的則是一致的。

## 二

既然股份公司是“人民資本主义”的鼓吹者們玩“人民資本主义”戏法的魔棍，那么，了解一下股份公司制度的实质及其在現代资本主义經濟中的作用，将有助于識破“人民資本主义”的騙局。

当资本主义还处在自由竞争的阶段，社会化的大生产进一步发展的要求，已經不能单纯依靠个别資本的积累来实现，而要求把

許多个别資本集中在一个股份公司里，以摆脱个别資本数額有限的束縛。由于股份公司实现了巨大的資本集中，资产階級才有可能举办过去无力举办的大規模的生产事业。馬克思說过：“如果必須等待积累，来使若干个别資本大到可以承当铁路建筑事业的程度，然后再来建筑铁路，恐怕世界今天还会沒有铁路出現。但集中会通过股份公司，一





反掌間，就把它弄成功。”<sup>①</sup>所以，股份公司是适应資本和生产集中的需要而出現的資本主义企业組織形式。股份公司制度的推行，加速了資本集中和生产积聚，从而推动了資本主义进入腐朽的、垂死的壟断資本主义阶段。

在壟断資本主义条件下，股份公司成为基本的企业組織形式，成为財政寡头对广大人民实行經濟統治的重要工具。

首先，股份公司是資本集中的工具。財政寡头用这个工具来动員閑散貨幣資本和零星資金，將它們集中在自己手中。股份公司組織程序一般是这样：一小撮壟断資本家集合一定數額的資本，創立股份公司，发行股票，把一部分留給自己，把其余股票出售；而持有股票者都成为企业的股東，有权根据股票的票面額从企业贏利中領取一份收入——股息。公司成立后，由股东大会选举最高領導机构——董事会。在这里，有选举权的不是股東而是股票，即有多少股票便有多少选举权。这种虛假的“公司民主”，保证了壟断資本家能够掌握董事会和公司的領導权力，从而支配从其他股東手里收集来的資本。壟断資本家犹嫌不足，还通过出售所謂“优先股票”（有稳定的收入而沒有选举权的股票），和保留所謂“普通股票”（收入不固定而有选举权的股票，有的还是“多权”股票）等詭計，更牢固地将公司的权力和财产掌握在自己手中。所以在股份公司制度的帮助下，“大資本合并了分散在世界各地的股東們的

不大的零星資本，变得更加雄厚了。”<sup>②</sup>

对于財政寡头們說，购买其他公司的股票、实行“参与制度”，是一种更加重要的进行資本集中的手段。大股份公司购买其他股份公司的股票达到一定數額（例如百分之二、三十左右），便使之成为自己控制的“女儿公司”；还可以通过“女儿公司”收购其他公司的股票，使之成为自己的“孙女公司”。財政寡头通过这种多級的“参与制度”，組成了一个从“母亲公司”到“女儿公司”、“孙女公司”的控制体系，从而掌握了超过其自有資本許多倍的資本。例如，洛克菲勒家族在一九五六年所控制的资产（六百一十四亿美元），竟为其自有财产（三十五亿美元）的十七倍以上。

掌握公司的控制权的壟断資本家主要是拿其他股東的而不是拿自己的财产来冒險，千方百計地进行詐欺。例如，攫取巨額的“創業利潤”（股票价格\*總額和投入企业的真实資本總額之間的差額）；实行“資本滲水”（发行的股票額超过企业的真实資本額）；將大量紅利分給“普通股票”；甚至伪造财务決算表，隱瞞巨額利潤，等等。总之，“公司的創

\* 股票价格是資本化了的股息。股票价格的高低主要取决于股息的多少和平均利息率的高低，其次取决于該公司股票供求关系。

① 《資本論》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791頁。

② 《資本主义财富的增长》。《列宁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版，第194頁。



立，股票的发行和股票的买卖，引起一整个体系的詐欺。”<sup>①</sup> 垄断资本家还利用每一次经济危机的机会，洗劫其他股东，吞并其他股份公司。这种情况，正好证明了马克思在十九世纪中叶的预见：在股份公司制度下，“成功与失败，同时都引起资本的集中，使剥夺以最惊人的规模来进行。在这里，剥夺已经由直接生产者，推广到小资本家和中等资本家了。”<sup>②</sup>

其次，股份公司被财政寡头用来建立对企业的绝对控制。

如前所述，财政寡头可以凭持有能够使他控制该企业的一定数量的股票盘据董事会。董事会是公司的最高领导机构，其职权主要是：选举和任命董事长、总经理、副总经理、若干专业经理等领导人员（在美国，董事长常兼总经理）；确定公司业务的总方针；审查企业经营的结果；分配利润等。总经理向董事会负责并提出报告，董事会向股东们

（自然是大股东）负责并提出报告。董事长、董事、经理的名单，其实是在选举前由少数大股东在幕后拟定的；他们或者是财政寡头的家族成员，或者是他们的亲信的代理人，但不管怎样，他们都是财政寡头的利益和意志的代表者和执行者，体现着财政寡头对企业的控制。在股份公司产生以后，虽然出现了资本所有权和管理职能分离的表面现象，但是，这种情况并没有改变财阀们对企业的支配权力，相反地是剥夺了广大的中小股东对自己财产的支配权力。

总之，在现代资本主义经济中，股份公司的使命，是帮助财政寡头们建立其对全体劳动人民的经济统治，决不像“人民资本主义”的鼓吹者所说的那样，是实现所谓资本“分散”和“剥夺”财政寡头对企业的控制权力。实际上，它已经扩大和加强了垄断资本对劳动的榨取，加剧了劳动人民贫困化的过程，激化了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矛盾。

### 三

美国的现实，也完全揭穿了股份公司的所谓“革命”作用，粉碎了所谓“人民资本主义”的谎言。

“资本民主化论”者把股票扩大发行的现象渲染为资本“分散”的趋势，宣扬垄断资本企业已为人民“占有”。然而，现实却完全与此相反。

近数十年以来，美国的股份资本明显地表

现出集中的趋势。据美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罗伯特·蓝普曼在今年年初出版的《1922—1956年最大的财富所有者在国民财富中的份额》一书中说，占美国成年人百分之一的人所拥有的股票价值，在全部股份资本总值中的

① 《资本论》第3卷，第560页。

② 《资本论》第3卷，第561页。



比重：一九二二年是百分之六十一·五，一九二九年是百分之六十五·六，一九五三年是百分之七十六，而現在至少占四分之三。至于美国劳动人民，特别是产业工人很少持有股票。据美国一位学者密尔斯统计，制造业工人中百分之九十八·六都没有股票。美国工资劳动者所持有的股票总值（包括工头的股份），只及洛克菲勒家族在“新泽西美孚油公司”这一家公司中所持有的股票价值的一半。面对这个事实，连美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里汝斯顿也认为宣扬股票广泛分散是“一种可怜的说辞”。

职工即使持有股票也决不意味着他们参与对企业的占有。第一，少量的股票在职工手中并不会使他们成为有产者。事实上，他们还是无产者，不得不出卖自己的劳动力，忍受资本家的剥削。而且资本家随时可以把他们赶出企业。第二，工人虽然凭小额股票获得一点收入，但是他们决不能获得对企业的任何控制权。何况有的公司（如“福特汽车公司”）只将没有选举权的股票售给职工，有的公司（如“艾索美孚油公司”）规定由一家信托公司掌管职工的股票。所以，职工决没有像垄断资本家那样，通过购买股票便取得了企业的所有权，而是使自己菲薄的储蓄变成了公司老板手中用以压迫自己的资本力量。

对于公司老板说，向职工推销小额股票，不仅没有“分散”企业的所有权，反而加强了他们的经济实力。因为他用更少的资本就足以

控制全公司的财产；可以更便当地操纵一切权力，为所欲为。

明明是资本集中，却说成是资本“分散”；明明是垄断资本家加强了对劳动者的剥削，却说成是劳动者“占有”了垄断资本家的企业。这是强盗的逻辑！

美国的现实，也完全揭穿了所谓“经理阶级”剥夺了财政寡头对企业的支配权力的谎言。

“经理制度论”者所吹捧的董事、经理等决不是什么“新阶级”，正如美国经济学家佩洛所说，他们“如果不是财阀的家族成员也基本上是出身于资产阶级的上层”。他们是被持有股票控制额的财阀委派来执行管理职能的，忠于职守犹恐不及，自然谈不上“剥夺”老板的权力。

“通用电气公司”被誉为摆脱了“银行和投资人意见的监督”的所谓“经理控制”的典型之一。根据一九五四年情况，该公司的董事会的十六名董事中，七名是摩根银行的董事，四名与摩根财团有密切联系；公司的主要经理人员也多是由摩根财团及其联盟者（波士顿财团）共同挑选的；连它的诉讼案件，也是由与摩根财团有联系的怀特与凯斯特律师事务所办理。事实上该公司完全处于它的最大的股东——摩根财团的控制之下。

经理人员的任务就是执行垄断资本的机能——榨取最大限度利润。连华尔街的喉舌《幸福》杂志一九五一年二月号的一篇吹嘘



“經理革命”的文章，也认为所謂經理人員不关心利潤的說法“至少是天真的”。同时經理人員自己都拥有大量的股票，并在“薪金”、“津貼”、“獎金”等名目下获得巨額的壟斷利潤。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財政寡头們普遍采取了一种給經理人員低价售与股票的奖励“計劃”，就为的是“要給那些对公司真正有貢獻的少数人提供額外的刺激”，即鼓励他們更积极地为自己榨取利潤。正如美国学者密尔斯所說，“經理是大所有者的代理人，而不是小所有者的代理人”，“富豪在公司中的地位拥有私人財產制度所固有的一切权力和特权。”

美国的现实，还完全揭穿了所謂职工的股票收入日益“削弱”了資本主义剝削的謬論。据統計，持有股票的一般职工一年获得的“紅利”約有四十美元，而一个“福特汽車公司”的工人，即使根据右翼工会的統計，一年至少要給福特財团創造六千美元的利潤。这种微不足道的“紅利”，何济于职工的貧困，不过是福特家族用来使职工忘却惨重

剝削的一种麻醉剂。此其一。其次，所謂“职工股票”彻头彻尾是一个騙局。仍以“福特汽車公司”为例，它曾宣布一周有一百美元收入的职工可以参加购买有价证券（一半是公債，一半是公司股票）的“計劃”。規定公司按半价将股票售給职工，但职工必須在五年內每周扣除百分之十的工資来购买。但是，职工中間有几人能够在五年內都一直有工作并且每周都負担得起这笔开支呢？一旦危机来临，公司解雇，股票价格下跌，职工連老本都将丢掉。連右翼工会头目也认为，这“計劃”对广大职工毫无“实惠”。其实，这不过是福特家族对职工实行又一次“文明的”掠夺。

綜上所述，可以看出，股份公司不可能而且事实上也沒有使現代美国資本主义“革命化”或“人民化”，只是加强了壟斷資本集团对人民的榨取和統治。“人民”和“資本主义”两个概念是不能相容的。只有經過社会主义革命，消灭了資本主义制度，人民才能成为生产资料的主人。

#### 四

“人民資本主义”的鼓吹者所兜售的反动論調，决不是什么新玩意儿。例如，所謂“資本民主化論”、“經理制度論”曾先后在二十年代和四十年代在美国出現过。至于所謂“收入革命論”，不过是美国长期流傳的“階級利益調和論”的又一个变种。这些說法在第二

次世界大战以后，在美国之所以盛行起来，并冠以“人民資本主义”的招牌，决不是偶然的。这是因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特别是随着东風压倒西風的国际形势的出現，美国壟斷資本集团亟需把“資本主义”描繪成“一个有前途的而不是垂死的社会”，以抵制



社会主义制度的巨大吸引力；亟需掩盖腐朽的垄断资本的统治，欺骗劳动人民，以窒息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人民资本主义”正是适应这种需要，由垄断资本集团及其辩护士们一手抓着股份公司的表面现象，一手挪来最陈腐、最庸俗的资产阶级经济理论，凑成的反动货色。

垄断资产阶级及其代言人之所以这样大肆鼓吹“人民资本主义”，是有它的政治经济目的的。

垄断资产阶级把“人民资本主义”的宣传，作为抵制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深远影响和粉饰现代资本主义的一种手段。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由于中国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出现，社会主义阵营已经包括了全地球四分之一的土地，而人口已占全地球人口的三分之一以上。社会主义经济的欣欣向荣和资本主义经济的危机重重，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吸引着资本主义国家的广大劳动人民向往于社会主义。在这种情况下，他们便大肆宣扬“人民资本主义”来美化垄断资本的统治，迷惑资本主义世界的劳动人民，使其放弃革命的理想和斗争。有的“人民资本主义”的鼓吹者，还诋毁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经济为“国家资本主义”，吹嘘“人民资本主义”比社会主义更为优越，攻击社会主义制度。美国资产阶级的代言人凯尔索和阿德勒在一九五八年出版的《资本家宣言》一书中，提出要以《资本家宣言》代替《共产党宣言》，以所谓“资本主义革命”来阻挠社会主义革命，建

立一种所谓“正当的资本主义”，即“一切都作为资本家参与生产”并“享有经济平等”的资本主义。

“人民资本主义”的宣传又是美国垄断资本集团反对国内工人阶级斗争的一种手段。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由于社会主义的影响日益扩大，美国垄断资本集团日益感到要窒息国内工人阶级斗争，除了继续采取镇压手段外，仅仅收买一小撮工人贵族已经不够，便强调要用“股票”、“红利”这根金黄色的锁链，把劳动人民牢牢禁锢在垄断资本的统治下。他们强调必须用发行“小额股票”的办法“使大多数人都感到他们分享到利润制度的利润，否则他们就会决定要别的制度”<sup>①</sup>；强调必须让每个人“都拥有与我们资本主义制度利害与共的东西（不动产、政府债券或股票）”<sup>②</sup>；叫嚷资本的所有权越是能够在“全民”中间分散，将越有可能阻止走向社会主义的趋向。并且把这种做法宣传为“人民资本主义”。实际上，这不过是垄断资本家掠夺和奴役工人的一种新手段。资本家推销股票给自己企业的职工，不但把工人的一部分工资收入变成剥削工人的资本，而且做了种种克扣工人的规定，例如不少垄断企业（如“美国钢铁公司”）规定职工如擅自“停工”或因有“过错”而被开除时，他们的股票便被宣布作废或停止分红。这样，就有利于资

① 约翰斯顿：《新资本主义》。刊《语音文摘》，1946年8月号。

② 《新闻周刊》，1956年7月30日，第61页。



本家扼杀工人的反抗，使工人听任他們的宰割。

“人民資本主义”的鼓吹者，还为財政寡头通过国家来榨取劳动者的国民經济軍事化和通货膨胀政策进行辯护。他們当中有一些人沿用凱恩斯主义，认为通货膨胀是龐大的国防支出等等“对购买力的人为刺激”的結果，并认为龐大的国防支出之所以需要是为了要保证“充分就业”。他們还把国民經济軍事化，歪曲为出自劳动人民的“需要”，认为这是多数劳动者沒有掌握私人資本以前，解决就业問題的一种手段，企图用“人民”的外衣，来装扮当前美国政府的反动政策。

凱尔索和阿德勒还拟制了一系列标榜为“人民資本主义”的政策。除了散布由資产階級国家“制止”資本私有权“过度”集中的謊言外，他們还說什么全民成了“資本家”而极力主張：政府应采取規定公司将全部淨收入分給股东的立法；应取消公司所得税和調整个人所得税；应取消提高工資和各种失业“救济”的立法。显然，实施这些政策，只是为了进一步地掠夺劳动人民，加强壟断資本家

的統治。

美国壟断組織还在自己的海外殖民企业中推行“資本民主化”的“計劃”。例如，据美国《福柏斯》杂志一九五七年七月十五日报道，两家在非洲的美国銅矿公司宣布五百名工資較高的非洲工人有資格参加“购买股票計劃”。它供称，該計劃的目的，是使当地劳动人民“亲身体驗私有制的好处”，并和美国殖民企业的“所有权发生一种利害与共的关系”。这說明，美国壟断組織阴谋用“人民資本主义”的宣傳和政策，来毒化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无产階級的階級意識和民族意識，妄图扑灭民族解放斗争。

从以上所揭露的种种政治、經济的目的中，可以更清楚地看到，壟断資产階級和它的代言人所进行的关于“人民資本主义”的叫囂和他們所采取的相应的措施，不过是美国壟断資本集团进行垂死挣扎时所抓住的一棵水草。“人民資本主义”决不能挽救美国壟断資本主义的灭亡。美国的未来决不属于美国壟断資产階級，而属于美国工人階級和劳动人民。

### 更正

本刊一九六二年第十二期第二十四頁右栏末一行的“該做的工作就必然很多”一句，应删去。





# 资产阶级议会民主的虚伪性

張友漁

资产阶级议会制度，在历史上是资产阶级革命胜利的产物。资产阶级实行议会制度，标榜“主权在民”、“议会至上”、“自由平等”等资产阶级的民主原则。在资本主义国家的法律上一般都规定，议会是由有公民权的公民选举产生的，是“表达公民意志的机关”。资产阶级的这种民主制度，同封建地主阶级的等级制度相比较，无疑是一个进步。但是，资产阶级推翻封建地主阶级，只是用一个剥削阶级的统治代替了另一个剥削阶级的统治，这就决定了资产阶级的议会民主，只能是资产阶级的民主。资产阶级议会制度是资产阶级对广大劳动人民实行专政的一种工具。可是，资产阶级总是掩盖议会的阶级性，他们一贯把议会装扮成全体人民的代议机关，制造“全民民主”的假象。适应着资产阶级的要求，修正主义者也把资产阶级的议会民主吹捧为“纯粹的民主”。例如，老修正主义者考茨基说，包括议会制度在内的资产阶级民主制，能够“使国家的全体成年成员……具有完全的平等权利”和“保护国家的反对派”。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者的谎言，显然是经不起历史事实的驳斥的。

从自由资本主义时期到帝国主义时期，资产阶级议会所具有的权力和所起的作用，

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在自由资本主义时期，由于无产阶级还没有形成一个强大的有组织的政治力量，资产阶级曾较多地利用虚伪的议会民主来对劳动人民进行统治。同时，自由竞争要求在资产阶级内部实行民主制，议会当时在解决资产阶级内部的利害冲突方面也起着重要的作用。因此，资产阶级议会在这个时期的权力和作用比在帝国主义时期要大。恩格斯在考察了英国国家制度后指出，英国“实际上下院在颁布法律，并通过内阁大臣们（他们只不过是下院的执行委员会）来管理国政”<sup>①</sup>。这一句话真实地描述了资产阶级议会在当时的权力和作用。

到了帝国主义时期，资本主义国家的权力逐渐集中到政府手里，议会的权力被削弱了，它实际上处于从属于政府的地位。这是因为帝国主义时期，垄断代替了自由竞争，经济上的垄断，必然要求国家权力的高度集中和政治上的垄断。控制着巨大财富的垄断资本集团，就愈来愈大地扩大军事官僚机构的权力，不断地降低议会的作用，使议会从属于垄断资产阶级的需要。同时，垄断资产

<sup>①</sup> 《英国状况 英国宪法》。《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684页。





阶级为要攫取最大限度的利润，加紧了对本国劳动人民和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人民的剥削和压榨，这就使得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帝国主义和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化，资本主义国家人民和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人民的反抗越来越强烈。在这种情况下，垄断资产阶级为了更有效地对外加紧推行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镇压民族解放运动，并且镇压国内人民群众日益强烈的反抗，绞杀无产阶级革命运动，也必须扩大军事官僚机构，加强政府的权力。列宁指出：“垄断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就是垄断资本主义）的政治上层建筑，就是从民主制转向政治反动。自由竞争要求民主制。垄断则要求政治反动。”<sup>①</sup>在这个时期，资产阶级议会虽然在形式上仍享有立法和监督政府的职权，但实际上，议会的立法权却往往被政府通过所谓“委托立法”和紧急命令权等等所代替。所谓议会监督政府，也由于政府控制了议会中的多数党而有名无实。正如列宁所说：“任何一个议会制的国家，从美国到瑞士，从法国到英国和挪威等等，那里真正的‘国家’工作是在后台决定而由各部、官厅和司令部来执行的。”<sup>②</sup>这已不像恩格斯所说的那样，内阁“只不过是下院的执行委员会”了。就是资产阶级学者也并不否认这一点，英国资产阶级法学家詹宁斯就曾露骨地说，议会对政府的“控制成分实在是微不足道的。……虽然从某种观点上说，下议院控制了政府，但是从另一种更为实际的观点说来，却是政府控制了下议院”。

议会民主的虚伪性在帝国主义时期是更

加显露了。有些帝国主义国家的垄断资产阶级，在有些时候，采取公开的法西斯化的形式实行专政，抛弃掉了议会民主的形式。在还保存着议会民主形式的帝国主义国家里，议会也只是垄断资产阶级为了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他们各个集团之间的矛盾，为了欺骗劳动人民，为了在国内和国外推行反动政策制造所谓法律根据而利用的一个工具。

资产阶级用两党制、多党制和三权分立制来掩盖资产阶级议会民主的虚伪性。他们说，两党或多党轮流在议会里控制多数就能够反映人民的意志，三权分立就可以使议会制约住行政和司法的专横，这样，资产阶级议会似乎真是什么“全民”的民主组织了。

资产阶级政党通过竞选方式，争夺议会席位，并使得议员有所更替。从表面上看来，似乎他们据有议会席位，是经过人民选择了的。实际上，这些不同名目的资产阶级政党，谁占有议会的席位，对于劳动人民来说，都是换汤不换药。美国是两党制的国家。可是，共和党和民主党都是美国垄断资本家的忠实走卒，它们无论哪一个在议会中占多数，都执行着美国垄断资本集团的政策。法国实行多党制。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法国议会中资产阶级政党的力量经历了很多变动，但是法国议会始终为资产阶级所控制。资产阶级议会制度的本质，正如列宁所说的，不过是“每隔几年决定一次究竟由统治阶级中

<sup>①</sup> 《论对马克思主义的讽刺和“帝国主义经济主义”》。《列宁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版，第34页。

<sup>②</sup> 《国家与革命》。《列宁全集》第25卷，第410页。



的什么人在議會里代表和压迫人民”<sup>①</sup>。

資產階級特別把資產階級各个政党之間的爭吵，吹噓为民主的表現。各个資產階級政党在竞选期間，往往对它的競爭对手进行謾罵、攻击，对选民許下許多諾言；在議會开会期間，他們也进行着无休止的清談和爭吵，有时甚至吵得很激烈。而实际上，他們之間的种种爭吵，归根到底，只是各个壟断資本集团經濟上的竞争和傾軋在政治上的反映，只是他們对劳动人民实行专政和对外进行侵略擴張的具体做法上的意見分歧。至于資產階級政党在竞选中对劳动人民許下的諾言，不管多么动听，都是一文不值的，只要选举一过，他們就把这些諾言置諸脑后，他們的所作所为，往往完全違反自己的諾言。

資產階級标榜所謂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立，議會、政府、法院互相制約，这也无法掩盖資產階級議會的階級实质。三权分立的学說，是在資產階級反对封建专制制度的斗争中产生的。这种学說的主要内容是，国家权力应分为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这三种权力分別由議會、政府和法院行使。那时的資產階級企图由他們所控制的議會来限制还在封建势力手里的行政机关的权力，使它不致过于专横。三权分立的学說，在反对封建制度的时候，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但在資產階級掌握了国家政权以后，立法、行政、司法三权都被資產階級所掌握，用来为資產階級的利益服务，因此，就談不上什么权力的分立。資產階級的議會和資產階級的政府、法院，只不过是进行着分工以實現資產階級的統治罢了。

資產階級議會民主的虛偽性，明显不过

地表現在資產階級議會的全部选举活动中。資產階級为了达到控制議會的目的，千方百计地阻止无產階級政党和其他劳动人民的代表进入議會。

資產階級首先是利用法律对选民的資格規定种种限制。例如，法国一七九一年宪法規定：公民按财产多少分为“积极公民”和“消极公民”，只有“积极公民”才有选举权，而“积极公民”的主要条件是交納一定的直接税。当时法国二千六百万人口中，“积极公民”只有四百万人。到了十九世紀中叶以后，由于劳动人民长期斗争的結果，資產階級在选民資格問題上作了某些让步。例如法国（一八四八年）、德国（一八七一年）先后在法律上宣布了男子的普遍选举权，英国（一八八四年）也进一步縮小了直接的财产的限制。但是，在西欧大多数国家，到十九世紀末，也只有約近百分之五的居民参加了选举。在一九〇〇年，英国选民的数目只相当于居民总数的百分之十一。

从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以来，資本主义国家的法律虽然大都先后取消了对选民資格的直接的财产的限制，但是，間接的财产的限制还是很多。有些国家规定，公民要取得选举权，必須在一定的选区内居住不少于法定的期限，具有一定教育程度，繳納一定賦稅等。例如，美国很多州和地方的法律都規定了居住一至二年的限制，不少州要求选民通曉英語并能“正确地讲解宪法”，美国南部有七个州的法律規定，选民必須繳納一定賦稅后才能投票。許多劳动者經常处在失

<sup>①</sup> 《国家与革命》。《列宁全集》第25卷，第409頁。



业半失业的状态中，到处颠沛流离，很多人不可能有固定的居住地点；他们受不起教育，自然大多数人没有能达到所要求的教育程度；他们收入微薄，不得温饱，或者没有工作，没有收入，当然缴不起税。因此，劳动人民仍然由于财产的限制而被剥夺了选举权。资产阶级借助间接的财产的限制来排除劳动人民参加选举，是更加狡猾的一种手法。它比直接的财产的限制容易欺骗人，而收到的效果却一样。据《纽约时报》报道，在美国一九六〇年选举中，就有八百万人因为居住资格的限制，一千二百万人因为教育程度和选举税等等限制，而被排斥在选举之外。

有些资本主义国家还采取了种族限制的办法。在美国，对黑人选举权的限制十分突出。美国统治集团使用很多方法阻止黑人进行选民登记。例如，美国南方各州主管选举的官员，经常向黑人提出一些只有学法律的大学毕业生才能回答的问题，当他们回答不出，或者只因为有一个拗口的字念得不对就要被剥夺投票权。据美国民权委员会一九六〇年的报告，在美国南方各州，已达到投票年龄的黑人中，只有百分之二十五的人进行了选民登记。

上面说的种种选举资格的限制，实际上否定了资产阶级宪法和选举法形式上宣布的普遍选举权，使大多数劳动人民的选举权遭到剥夺，对无产阶级和其他劳动人民代表进入议会设下了第一重围墙。

其次，资产阶级还规定了许多限制无产阶级和其他劳动人民提出候选人的办法。例如，美国有些州规定，民主党和共和党以外

的任何第三个党，如在上一次选举中未取得一定数量的票数，它们在提出候选人时，就必须有一定数量的选民签名表示支持，才能参加竞选；对签名人数的规定，有的竟多到几万人。但事实上，签名支持美国共产党候选人的人，就有遭到严重迫害或丧失职业的危险；签名人的家属和亲友，甚至也要受到联邦调查局等特务机关的追究。这样，美国共产党实际上被剥夺了提出自己的候选人参加竞选的权利。同时，根据一般资本主义国家选举法的规定，候选人必须缴纳巨额的保证金。在英国，候选人须缴纳一百五十英镑的保证金，如果候选人所获选票不到投票总数的八分之一，保证金就要被没收。在法国，根据选举法规定，候选人必须缴纳十万法郎作保证金。这种保证金对于无产阶级及其政党来说，是一个沉重的负担，它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他们提出自己的候选人。这样，即使一部分劳动人民取得了投票的权利，但是由于他们不可能或者难于提出自己的候选人，这种投票权利也变得毫无意义。

第三，资产阶级还运用修改选举制度和重新划分选区等措施，使议员的选举获得有利于他们的结果。

资产阶级总是根据自己的利益和阶级力量的对比关系来运用选举制度。在资产阶级力量较强的资本主义国家里，一般都采取多数选举制。由于他们在各个选区大都能有把握获得较多选票，采取这种制度，就使他们能攫取绝大多数甚至全部议席。如美、英等国就是采取这种选举制度的。在意大利，一九五一年二月，以基督教民主党为首的右翼



集团在议会通过的关于市政委员会选举法，也是采用的多数代表制。对于这样一个反动的选举法，意大利当时的内政部长谢尔巴曾毫不隐讳地宣称，它的唯一目的，就是“要削弱共产党通过市政委员会操纵国家生活的那种势力”。在资产阶级政党较多、资产阶级力量比较分散的国家里，他们可能采取比例选举制。这种制度是按照各政党所获选票的多少为比例来分配议会的席位，它可以使林立的资产阶级政党都在议会中获得一定席位，同时，还可以防止获得较多选票的无产阶级政党得到更多的议席。

但是，当资产阶级看到共产党的影响扩大，现行选举制度不利于他们的时候，就要对选举制度加以修改，采取更加反动的选举制度，以保证得到有利于他们的选举结果。例如，一九五一年法国国民议会就通过了选举制改革法，以“一轮多数联盟制”代替了原来的比例选举制。根据这一制度，各政党可以结成联盟参加选举，如某一政党或政党联盟获得某选区百分之五十以上的选票，即可独占该选区的全部议席；如都得不到百分之五十以上的选票，该选区议席即按各党所得票数比例分配。法国在一九五一年的选举中，由于法国政府使用这一选举制度，使得法国共产党虽然获得了五百多万张选票，但只能在议会中获得九十四席。一九五八年的选举中，戴高乐政府又采用了“单一提名二轮多数制”。根据这一制度，在每一个选区中只选出一名议员，在首轮投票中候选人必须获得绝对多数选票才能当选，如果没有一个候选人获得绝对多数选票，即进行第二轮

投票。在第二轮投票中，参加竞选的政党获得相对多数就可以当选。这样，资产阶级政党就可以结成联盟争取相对多数来对付共产党。因此，在一九五八年的选举中，共产党虽然在第一轮投票中获得了三百八十八万余票，占投票总数的百分之十八点九，在第二轮投票中获得了三百七十四万余票，占投票总数的百分之二十点七六，但总共只得到十个议席，还不到议席总数的百分之二；而在第一轮投票中，得票少于共产党的极右政党“保卫新共和联盟”却窃取了一百八十八席。

资产阶级为了保证能选出他们的代表，还采取了重新划分选区的办法，以削弱共产党的力量。他们在重新划分选区时，把无产阶级力量占优势或直接控制的地区，不划为一个选区，而把它分成若干块，分别并到保守力量占优势的选区里；或者在无产阶级人口占优势的工业区减少选区，而在保守势力有较大力量的农业区增设选区。前一办法使无产阶级政党无法集中选票，选出自己的代表；后一办法则使无产阶级不能按照票数的比例选出自己应有的代表。

由于资产阶级采取了反民主的选举制度和重新划分选区的办法，即使无产阶级和其他劳动人民提出了自己的候选人，也难以当选。

第四，资产阶级还通过政治、经济、军事的力量，操纵和控制选举，用种种卑鄙手段阻止人民正确表达自己的意志和歪曲选举的结果。

资产阶级往往在进行竞选活动时，使用大批金钱，动员所有的宣传工具，向选民进



行欺騙宣傳，同时，雇用一批流氓騙子为他們張罗选票，或者直接收买选票。一九五三年意大利議會选举中，資產階級右翼政党花了几十亿里拉（意货币名）来进行竞选活动。他們对乡村和其他居民区中的选民贈送通心粉，有些地方送給选民一只左脚穿的鞋，同时告訴这些选民，如果他們的候选人当选，还会得到那只右脚穿的鞋。选民有时还得到半張一千里拉的紙币，如果給他們錢的候选人当选，他們就可以得到另外半張紙币。收买选票的情况，在其他資本主义国家中同样是十分惊人的。在金錢收买的同时，資產階級还兼施政治威胁。西德在一九六一年大选时，仅仅在七月底八月初的一个星期中，西德警察和司法部在北萊茵——威斯特伐利亚就逮捕了六名以个人身份作为联邦議院候选人的德国共产党员。

資產階級在选举中营私舞弊的行为是不胜枚举的。他們有的在進行选民登記时，故意不把一些具有选举資格的劳动人民列入选民名册；有的把已死或已迁出的人登記进选民名册，然后用这些人的选民证投資產階級政党的票；还有的用造假票和換票等方法来使自己的候选人当选。

在无产階級和其他劳动人民力量强大的情况下，資產階級如果靠上述那些办法还达不到目的时，他們就派出軍隊、警察、特务、打手，用反革命的暴力和血腥的鎮压，来保证他們的候选人当选。他們或者杀害、迫害共产党和其他进步党派的候选人，或者采取各种野蛮的暴力行为，阻撓替进步候选人进行选举鼓动，或者在选举日出动大批軍警，鎮

压选民。日本一九六〇年众議院的选举中，池田政府除了頒布反动法令，剝夺人民集会、游行的权利，限制人民的选举自由以外，还专门召开了全国警察头目會議，調动了一万八千名刑事警察和五万名便衣警察，加强对民主力量的鎮压，特别是采取了最殘暴无耻的手段破坏日本共产党的竞选活动，并且唆使法西斯暴徒杀害了社会党領袖淺沼稻次郎。当时，共同社也不得不承认这次选举是“严重破坏公正选举的金錢和权力的选举”。

第五，即使共产党和其他劳动人民的代表通过重重障碍当选为議員，資產階級还可以采取种种手段来否定选举結果。資產階級可以宣布全国或部分地区选举“非法”，重新进行选举；可以利用資格审查，确认某些議員不具备当选条件；可以借口維護議院秩序，將議員加以“扰乱秩序”的罪名予以开除。資產階級用这种种办法剝夺已經当选的共产党和其他劳动人民代表的代表权，把他們排斥在議會之外。甚至当共产党所支持的某个資產階級政党在选举中获胜，不利于整个資產階級的統治时，他們也要否定选举的結果。这里可以举一个很明显的例子。在阿根廷，由于亲美卖国的执政党（不妥协激进公民联盟）在一九六二年三月十八日的选举中失去十二个省的席位和众議院的絕對多数，而共产党所支持的庇隆主义党却获得八个省长的职位和众議院中的四十三个席位，阿根廷統治集团竟于三月二十日下令取消庇隆主义党在五个省赢得的选举結果。四月二十四日它进而取消一九六一年十二月以来的所有省市选举結果（实际上取消了庇隆主义党在十





一个省当选省长的结果),四月二十五日又取消了一九六二年三月十八日的联邦选举的结果。五月二十日阿根廷统治集团进一步地悍然宣布停止议会工作,命令改组政党。

大量事实表明,资产阶级总是能够使用各种伎俩,甚至采用实际上把共产党置于非法地位的办法和采取暴力行动,阻挠共产党的代表进入议会,使共产党难以在选举中获得资产阶级议会中的多数席位,或者使共产党一个席位也得不到。在美国国会中,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一直都是民主党和共和党分据了国会的席位(从一九四五至一九四六年的第七十九届国会到一九五三至一九五四年的第八十三届国会,只有进步党和美国劳工党各占有一个或两个席位,从八十四届到现在的第八十七届国会,席位则完全为民主党和共和党所占有),国会中根本没有一个共产党的席位。西德一九六一年选出的联邦议院,全部席位为三个资产阶级政党所瓜分。其中基督教民主联盟占二百四十一个席位,社会民主党占一百九十一个席位,自由民主党占六十六个席位。在英国,共产党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只是在一九四五年的议会选举中有过两个席位,在这以后的五届选举中,资产阶级一直没有让共产党获得一个席位。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由于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各国人民的革命力量有了很大的发展,因而战后最初几年,在一些资本主义国家的议会中,共产党的席位一度有了增长。但是,这并没有也不可能改变资产阶级议会的本质。而且资产阶级总是能够设法削弱共产党在议会中的地位。很明显的事实是,法国共产党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虽曾

一度争得较多的席位,但是资产阶级却不让它能够稳定地保持住这些席位。法国共产党一九五六年在全国议会的五百九十六个席位中占了一百五十一个席位,可是,一九五八年由于戴高乐政府采取了有利于资产阶级的选举法,就使法国共产党在全国议会中的席位,骤降为十个席位。法国共产党是法国第一大党,但目前它在议会中却是少数派,即使在戴高乐上台以前,资产阶级也没有让它在议会中占过绝对多数。在意大利,共产党在议会中占有的席位,比其他资本主义国家的共产党是多一些,但是,意大利资产阶级政党在议会中仍然拥有多数席位,而共产党在众议院的五百九十六个席位中只有一百四十个席位,在参议院的二百四十六个席位中只有五十九个席位。

资产阶级除了在选举中限制共产党的活动以外,还运用各种手段来限制共产党的代表在议会中发生作用,以至剥夺他们的发言权和人身自由。因此,共产党即使在议会中获得一定数量的席位,他们的活动仍然会由于资产阶级的破坏而发生种种困难。

资产阶级仅仅是通过他们所谓“合法”的手段,就可以大大地限制共产党的代表在议会中对国内外的重大问题发生影响。他们首先是操纵议会的表决机器,通过有利于他们的决定,而对于带有进步意义的提案,往往运用议会的常设机构加以搁置,或者玩弄烦琐的立法程序和多数表决等手段加以否决。

当资产阶级感到议会这个工具有些运用不灵时,他们还可以公开修改宪法,扩大行政机构的权力,以进一步削弱议会的作用。法国一九五八年通过的戴高乐的宪法就规



定，总统有权任免总理、政府其他成员和军事人员；在所谓非常时期，总统还有“根据形势的需要采取必要的措施”的全权。这样，大权实际上集于总统一身，议会立法权则削弱到仅限于对十几种事项作原则的讨论和规定，具体立法则由政府制定，而且政府还可以要求议会将这点有限的立法权的一部或全部委托政府代行。同时，议会通过的法律，还必须由政府操纵的宪法委员会审查后，才能公布生效。凡是宪法委员会认为不合宪法的法律，就可以不予公布。至于议会组织政府的权力，实际上也取消了，因为按照宪法规定，总统任命总理和政府其他成员，不需要议会以绝对多数通过信任案。在这样的情况下，共产党即令在议会中占有相当多的议席，对于资本主义国家政府的决策和活动，不仅不可能起任何决定性作用，甚至不可能起多大的牵制作用。

资产阶级为了限制共产党在议会中的作用，甚至连自己制定的宪法也不惜任意践踏。他们可以违反宪法，破坏议会的法定职权。资产阶级还往往运用暴力手段对反对党派议员的人身进行迫害，强制通过他们的法案。一九六〇年五月二十日，日本岸信介内阁用七百名法西斯暴徒、五百名警察殴打反对党议员，并用三个到六个警察架一个议员的野蛮手段，把共产党和社会党议员赶走，然后由自由民主党议员单独通过了“日美共同合作和安全条约”，就是一个显著的例子。

如前所述，资产阶级为了保持对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的统治，不但要利用议会这个工具进行政治欺骗，而且越来越凭借军事官僚机构对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进行

压迫和剥削。无产阶级要想求得自身和全体劳动人民的彻底解放，就必须采取革命手段打碎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包括资产阶级的议会制度，建立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以保障最广大的人民得到真正的民主。但是，在革命时机还没有成熟的时候，无产阶级政党仍有必要尽可能利用资产阶级议会的讲坛开展斗争，揭露资产阶级的欺骗，并以具体事实来教育人民群众，提高他们的政治觉悟。共产党人如果不懂得或者否定利用一切机会在议会内加强对资产阶级的斗争，这是不对的。在开展议会斗争方面，各资本主义国家的共产党进行过不少的工作，它们在揭露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捍卫劳动人民起码的民主权利和经济利益等方面，迫使资产阶级作过某些让步，取得了一定的胜利。但是，这些胜利的取得，也是同共产党领导无产阶级和其他劳动人民在议会外对资产阶级进行的斗争分不开的。事实证明，议会中的斗争必须同群众斗争结合起来，而组织广泛的、深入的群众斗争在任何时候都是最重要的。议会斗争只能是无产阶级革命政党同资产阶级进行斗争的一种手段，而不是唯一的斗争手段。列宁说得好：“为了通过选举和各种党派在议会中的斗争达到教育群众的目的，参加资产阶级的议会活动对革命无产阶级的政党来说是必要的。但是，如果把阶级斗争局限于议会斗争，或者认为议会斗争是最高、决定性的、支配着其余一切斗争形式的斗争，那就是实际上转到资产阶级方面去而反对无产阶级。”<sup>①</sup>

① 《立宪会议选举和无产阶级专政》。《列宁全集》第30卷，第241页。





## 新的“挑战”和新的“选择”

· 向 阳 ·

“挑战”，这是目前美国当权派人物很爱用的词儿。他们把社会主义阵营的繁荣强大，说成是“超越一切挑战之上的挑战”。他们把民族独立运动的蓬勃发展，说成是今后十年或者几十年的“巨大的挑战”。美国原子垄断地位的丧失，苏美间导弹差距的扩大，等等，都被认为是对于美国的“挑战”。总之，他们认为，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是对于美国的“挑战”的年代。

当二十世纪进入六十年代之际，美国统治集团“选择”了民主党，据说，就是为了应付这些“挑战”。在洛克菲勒（这是目前美国最富侵略性和有影响的垄断集团之一）兄弟基金会的主持之下，腊斯克（现任美国国务卿）曾主撰了一个叫做《本世纪中叶对美国外交政策的挑战》的研究报告，对从一九五八年开始的十年内美国外交政策的基本思想和目标——建立一个“新世界秩序”，提出了纲领性的建议。同时，亨利·基辛格（现任肯尼迪的国家安全问题顾问）也写了一本书叫做《选择的必要》，为美国统治集团提供了应付这些“挑战”的许多“选择”。肯尼迪正是在荷包里夹着这些货色走进白宫的。

难道美国真的面临着如肯尼迪之流所经常喧嚷的什么外来的“侵略”、“干涉”和“武力威胁”之类的“挑战”吗？显然没有。真实的情况是，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特别是最近若干年以来，由于社会主义和民族独立运动这两股伟大历史潮流的日益高涨，国际政治力量的对比确已发生了并且继续发生着不利于美国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的变化。腐朽的帝国主义制度本身受到这种历史潮流的越来越沉重的冲击，而有“日薄西山，危在旦夕”之感。如果“挑战”指的是这个意思，那倒是合乎逻辑的。因为根据不可抗拒的客观规律，新生的东西总是要向腐朽的东西挑战的，而且最后也必然是要取而代之的。

肯尼迪的一些代言人曾经说肯尼迪的所谓“总战略”的基本目的，概括起来说，就是想在当前面临的“发生了变化的局势”中能够作出“选择”。据说，肯尼迪是要能够“选择”如何应付“挑战”，而不是“让‘选择’加在我们（美国）头上”。他们甚至认为，在肯尼迪的“总战略”中，“选择”这个词儿是一个“关键性的字眼”。

肯尼迪上台以来，究竟是怎样进行“选



擇”的呢？時間雖然不長，花樣確實很多。但是，變來變去，政治上不外搞兩手策略，軍事上不外搞三種戰爭。這就是說，為了更加狡猾地推行侵略政策和戰爭政策，肯尼迪政府既“選擇”戰爭的一手，也“選擇”“和平”的一手，而以“和平”的一手來掩護戰爭的一手。為了進攻和顛覆社會主義陣營，鎮壓和撲滅被壓迫人民和被壓迫民族的革命鬥爭，肯尼迪政府既“選擇”大規模的先發制人的核武器戰爭，又“選擇”使用常規武器或者“戰術”原子武器的“有限戰爭”，並且已經“選擇”了南越等地作為“特種戰爭”的試驗場。這些所謂“選擇”，已經成為人們的常識，沒有什麼新鮮可言了。

現在，美國當權派人物自己喧嚷，他們又面臨一個新的“挑戰”，因而要被迫作出一項新的“困難的選擇”。

這個“挑戰”來自“自由世界大家庭”的內部，來自美國在北大西洋集團中的西歐伙伴。肯尼迪在今年一月間提出的“國情咨文”中就發出第一次的緊急信號：“歐洲共同市場的發展提出了最大的挑戰”。緊接着，他在“貿易咨文”中又警告說，由於一個“短短時期中的”一些“基本上是新的、全面的事態發展”，美國需要應付“新的挑戰和機會”。到了今年五月間，美國財政部長狄龍更把西歐國家經濟實力的增長作為三個“巨大的挑戰”之一，同社會主義陣營和民族獨立運動的“挑戰”相提並論。

究竟是什麼原因使得美國統治集團這樣驚惶失措呢？簡單地回顧一下美國統治集團

“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的情形，是頗有意思的。大家知道，在戰後的年代里，美國政府在反共反蘇的旗號下，從執行“復興”西歐的“馬歇爾計劃”，扶植西歐各國的反動勢力，尤其是西德的軍國主義勢力，策劃各種“西歐整體化”的方案，直到建立侵略性的北大西洋軍事集團，無一不是為了在經濟上、政治上和軍事上全面控制西歐。這是美帝國主義的大西洋政策的基石，也是它的“全球戰略”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但是，曾幾何時，形勢的發展完全出乎美國統治集團的意料之外。西歐主要國家的經濟得到了恢復，它們要聯合起來同美國爭一日之短長的趨勢，越來越明顯了。

對於正“被另一次經濟衰退的陰影所吞噬”、並且一直以西歐國家的“盟主”和“保護人”自居的美帝國主義，這個新的“挑戰”確實具有十分嚴重的性質。因為它既是經濟方面的，又是政治方面的，而且也是軍事戰略方面的。

一個排它性的西歐“共同市場”已經長起牙齒。今年七月一日起，“共同市場”六國內部的工業品關稅將再降低百分之十，總共將降低達百分之五十，某些農產品關稅也將減少達百分之三十五。如果英國也能參加進去，這樣一個處於單一對外關稅保護之下的西歐經濟集團，用肯尼迪的話來說，就將“擁有比我們多百分之五十的人口，他們共同工作，共同進行競爭，……他們的經濟發展速度一直將比我們快一倍”。如果美國被排斥在這個巨大的市場之外，美國就將失去



一个几达三亿消费者的巨大市场，而无法保持它对西欧的每年六十多亿美元左右的出口贸易额，就将减少大量的外汇收入，增加大量的黄金外流，就会大大加深它在财政经济方面的困难。与此同时，这样一个西欧经济集团，也必然要在资本主义世界、特别是在广大中间地带的市场争夺战中，成为美国的日益强大的敌手。正如英国《泰晤士报》转弯抹角地说：“欧洲作为一支单独的经济力量的崛起，还会在争取非洲、亚洲和南美洲不结盟地区的战斗中成为又一个主角。”

不仅如此，一个排它性和竞争能力日益加强的西欧经济集团，必然在政治上要求有更大的发言权，在军事上要求有更大的独立性。法国外交部长德姆维尔毫不含糊地表示：“共同市场根据定义是一个欧洲体系。它必须确定并执行一个共同的对外政策。它必须有一个防务政策。它将一点一点地在大西洋联盟中变成一个同美国平等的伙伴。”这是最近几年来美国同西欧主要国家之间进行控制和反控制斗争的中心内容。法美矛盾的尖锐化，则是这个斗争的突出表现。雄心勃勃的法兰西第五共和国总统戴高乐，俨然以西欧代言人的姿态，同大西洋彼岸的肯尼迪大唱对台戏。他坚持要建立一个“各祖国的欧洲”，一个“在经济上，也在政治上、军事上团结的欧洲”，实际上就是要建立一个在各方面都不受美国支配的所谓“平衡力量”或“第三种力量”，同美国分庭抗礼，平起平坐。这当然是对于美帝国主义的“领导权”的露骨的“挑战”。怪不得若干时期以来，美国当权派

人物和代表性报刊歇斯底里地掀起了一个“孤立戴高乐”的运动。

在这个新的“挑战”面前，怎样办好呢？办法之一：钻进“共同市场”，好像孙悟空钻进铁扇公主的肚皮去捣乱一样，“让我们在法国、意大利或（西）德国建造工厂”（肯尼迪语）。但是，不行，因为这样美国“将会失去资本、黄金和就业机会”。办法之二：“攻心为上”，或者利用英国这匹“特洛伊木马”去破坏扩大的西欧经济集团，或者通过法国和西德内部的反对势力去削弱巴黎——波恩轴心。美国事实上也一直这样做。但是，看来一时难于收效。办法之三：“以退为进”，如果“共同市场”对美国不做开大门，美国“就出钱来承担它在西欧的军事义务”。华盛顿的政客们曾屡次以此相要挟。但是，这更不行，因为美国统治集团的决策人根本不愿、也不敢考虑退出西欧的问题。

显而易见，以上这些办法都不能“选择”。据说肯尼迪终于拟定了一个“宏伟的大西洋计划”，这大概可以说是他的一项最新的“选择”吧！

根据这个计划，第一步，美国将同包括英国在内的西欧经济集团达成主要是有利于美国的互相减税或者免税的协议；第二步，将建立由美国领导的、包括“欧洲共同体”在内的“大西洋共同体”。不久以前，腊斯克对此特别作了阐明。他说：“我们期望同一个统一的欧洲合作，这不仅在贸易方面，而且在建立和保卫一个自由大家庭的其他必不可少的工作方面。这些工作不能单独由美国或者



单独由欧洲来完成。我们需要和我们紧密合作的强大的伙伴。这个强大的伙伴将是一个整体化的欧洲。进行密切合作的机构将是越来越团结的大西洋共同体，在这个范围内，我们和欧洲可以密切合作。”这位国务卿先生煞费苦心，企图用虚伪笼统的外交辞令，来掩盖自己的真情实感。这当然是瞒不过美国的“强大的伙伴”的。英国的《经济学家》在一篇文章中就曾这样告诉美国，“如果欧洲人组织他们自己的共同体，就必须允许他们按自己的方式来组织”，意思是说，欧洲的事务不用美国指手划脚，越俎代庖。戴高乐更直截了当地给了美国一巴掌，他在法国中部和东部巡视时，冲着大西洋彼岸的肯尼迪说，法国“应该有它自己的人格，因而应该有它的武器、它的政策、它的影响”，“法国并不是由任何其他国家拖着走的”。

很明白，美国的“选择”，并不等于西欧国家的“选择”。“凡是对于美国好的，对于欧洲也是好的”这种愚人哲学显然早已过时了。究竟西欧是美国控制的“超国家的西欧”呢，还是以巴黎——波恩轴心为基础的“统一的西欧”呢？究竟北大西洋集团是美国的“一言堂”呢，还是成员国尤其是主要成员国的“合伙公司”？究竟由美国单独决定是否发动一场首先将毁灭西欧的核战争呢，还

是由帝国主义国家共同来“按电钮”？对于这些利害冲突的重大问题，美国有自己的“选择”，西欧国家也有自己的“选择”。“人不为己，天诛地灭”，这本来就是帝国主义世界的铁则啊！

当然，在“选择”问题上，西欧国家也同样是各打各的算盘。譬如说，不论是在英国参加“共同市场”问题上，或者是在“欧洲政治统一”的形式问题上，还是在拥有核武器和对美国的态度问题上，戴高乐和阿登纳就不可能是真正一致的，而这两个被称为“极权主义的老人”同惯于玩弄欧洲均势的英国绅士麦克米伦，更是难于完全合拍的。

西欧经济集团对美国的“挑战”，是帝国主义国家之间尤其是美国同西欧主要国家之间的矛盾发展到一个新阶段的重要标志，也是资本主义总危机进一步加深的重要标志。尽管肯尼迪可以发一百次誓：“我们不能让自己同它（西欧）分开”，“我们不能让它（西欧）离开我们，而要靠摧我们”。但是，帝国主义集团加速走向四分五裂的趋势，却是无论如何也改变不了的。尽管肯尼迪还会被迫作出这样或者那样的新的“选择”来应付这种或者那种新的“挑战”，但是，对于腐朽透顶的美帝国主义，可供“选择”的余地毕竟不是越来越多，而是越来越有限了。



# 利 害 篇

关 鋒

清人梅曾亮的《記棚民事》（《柏硯山房文集》卷十），就開垦荒山一事說到利害关系的問題。其大意如下：

董教會在任安徽巡撫時，上了一封奏折，力主准許“棚民開山”。其理由是：反對開山的“皆溺于龍脉風水之說，至有以數百畝之山保一棺之土”者；“而棚民能攻苦茹淡，于丛山峻岭人迹不可通之地，開种旱谷以佐稻粱，人无閑民，地无遺利，于策至便，不可禁止以啟事端”。梅曾亮看過這封奏折，認為很有道理，表示贊成。可是，後來他到了宣城問及此事，鄉人所說却大不相同，他們說：“未開之山，土堅石固，草樹茂密。腐叶積數年可二三寸。每天雨，从樹至叶，从叶至土石，历石罅滴瀝成泉，其下水也緩，又水下而土不隨其下。水緩，故低田受之不为災；而半月不雨，高田犹受其浸漑，今以斤斧重其山（把山砍禿了），而以鋤犁疏其土，一雨未毕，沙石隨下，奔流注壑，澗中皆填汚不可貯水，毕至窪田中乃止。及窪田竭而山田之水无繼者。是为開不毛之土而病有谷之田，利无稅之僮而瘠有稅之戶也。”梅曾亮覺得這道理也是很對的。究竟是准許開山對還是禁止開山對呢？梅曾亮感慨地說：

“嗟夫！利害之不能兩全也久矣。由前之說，可以息事；由后之說，可以保利。若无失其利而又不至如董公之所忧，則吾盖未得其术也。故記之以俟夫习民事者。”

梅曾亮所說的利害“不能兩全”，包括着一個階級利害的問題。在階級社會里，到山上去開荒的无地貧民，同占有平壩沃土的富戶，确是不可調和的利害冲突。梅曾亮感到困惑的是，如果不准窮人開山，难免鬧事；讓他們開山，就会造成水土流失，影响山下耕地，难以兩全。現在，在我們的社会主义制度下，这种貧民和富戶間的矛盾是不存在了。但開垦荒山对于生产的利害問題，却仍然是一个問題。我們的办法是，既考慮到開山之利，又考慮到開山之害，权衡利害之輕重，得出的結論是：在有些山区，只能封山造林，不能開荒；有些山区則可以有限制的開荒，即根据当地情况限制在一定的坡度之內，同时做好水土保持工作。在土层較薄、坡度較大的地方開垦荒地，纵然一时可以得利，但必定遭致水土流失之害，那就一定要坚决保持水土，而不要乱開山荒。这叫做“利中取大”。如果只考慮到開山扩大播种



面积之利，而决定无限制的大片的开山，那就是贪小利而丢大利了。

在社会工作中，在同自然界作斗争中，利害相連的情形是很多的，例如：有些事情直接对当前有利，同时又直接对当前有害，其中有利大害小的，也有利小害大的；有些事情，在当时看来，虽然是有利无害；但经过一系列的中間环节，会生出长远的患害，甚至是很大的患害；也有些事情，对当前有小害，而对长远有大利；还有些事情，从某个局部看来有利，但从全局看来有害，或者相反，对某个局部有暂时之害，而对全局有利。总之，利害相連的情况是十分复杂的。古人就多少看到了这一点。战国墨家指出，辩的目的之一，即是“处利害”（《墨子·小取》）。

对于那种真是有百利而无一害的事，或者有百害而无一利的事，当然是很容易作出办与不办的决定的；但遇到既有某种利，又有某种害的事，那就必须十分慎重。如果只看到利的方面，看不到害的方面，冒冒失失地办起来，结果可能是贪小利而受大害；如果只看到害的方面，看不到利的方面，看到一点儿患处就不敢设法去办，那恐怕可办的事就很少了。

两千多年前的孙武说过：“是故智者之虑，必杂于利害”（《孙子兵法·九变》）。用我们现在的話来说，就是要用“两点論”来看问题，也就是说，必须从客观过程固有的矛盾中，从事物错综复杂的各种联系中，从当前和长远、局部和全局的关系中，弄清有利的方面和有害的方面。当然做到这一点是不

容易的，既需要有唯物辩证的思想方法，又需要有对所处理的问题的科学知識。但我们必须力求做到这一点。孙武说：“故不尽知用兵之害者，则不能得用兵之利也。”\*（《孙子兵法·作战》）岂止用兵，做其他事情，也是不尽知其害，就不能获得其利。因为，不尽知其害就不懂得采取何种措施去防患，在沒有准备的情况下，患处还会扩大开来；这样，本来可能得到的利也会得不到。

弄清了利害两方面，就可以设法防患，或者使害縮减到最小限度，因而使利得到最大的保障。不过，也有这样的事情，看清了它的患处，但受着当前科学技术条件的限制而不能防止。碰到这样的事情，只能是权衡利害的輕重大小，从而决定办还是不办。有患害较大，防患问题得不到解决，因而绝对不能动手的；有利大害小，需要忍受一点患害而必须兴办的，因为如果不忍受这点暂时的患害就会遭到更大的和长远的患害。墨家說得好：“利之中取大，害之中取小”，“害之中取小也，非取害也，取利也”（《墨子·大取》）。

梅曾亮看到了开山这件事的利的方面，又看到了害的方面，但结果还是不知道究竟应当怎样办才好，这当然是因为他对开山这件事毕竟还没有深知。中国古来也有这样的人，他们看出了利害相連的情形，就宣布說：有一利必有一弊，因而遇事采取消极无为的态度。这是懦夫的态度，当然是我們所

\* 原作“则不能尽知用兵之利也”，据《通典》校改。





不取的。

但是，人們在对一件事的利害关系还没有真正弄清楚，还没有找到恰当的处理办法的时候，暂时采取存疑态度，并积极地去进行调查研究，却是应该的。在某件事情的内部矛盾和它同各方面的复杂联系尚未充分暴露时，我們往往看不到或看不清它的某个方

面。这就要老实地承认，继续调查情况，参照历史经验进行研究，并且同时在典型试验中摸索，逐步地去把利害两个方面摸清楚，找出取利防害的方法。

要做好各种具体工作，需要各门具体的科学知识。梅曾亮说得对，“吾盖未得其术也”。弄清具体事物的利害，以取利防害，那

## 艺术风格的独特性和多样性

——文艺随笔

朱

馮其庸

古往今来，偉大作家、艺术家的艺术风格总是有它的独特性的。这种独特性，也就是作家在艺术上的独创性。对于许多文艺作品，我們常常能够不看作者的名字就辨认出这是誰的创作，就是因为我們已經熟悉作者的独特风格的緣故。

我国的文学史、戏剧史和繪画史，呈現着绚烂多采的面貌，这证明我国历史上的作家和艺术家們，是善于創造独特的艺术风格，善于完滿地呈現自己的艺术个性的。从文学方面來說，我国先秦时代最偉大的詩人屈原，首先以他独创的艺术风格，照耀着我国的文学史。班固說他的风格“弘博丽雅，为辞賦宗”。刘勰說他的风格“气往躡古，辞来切今，惊采絕艳，难与并能”；又說：“不有屈原，岂見离騷。惊才風逸，壮志烟高。山

川无极，情理实旁。金相玉式，艳溢鎔毫。”他們对于屈原风格方面的評論，虽然有詳略的不同，但其基本精神却是一致的。司馬迁也是在艺术风格上独树一帜的。唐代的韓愈說他的风格“雄深雅健”；宋代的苏轍說他的风格“疏蕩，頗有奇气”；明代的茅坤說他的风格“出風入騷”，“疏蕩適逸”；清代的刘熙載說他的风格“精思逸韵”，“逸气纵横”。这些評語說明，屈原和司馬迁风格的独特性是大家所公认的。在繪画方面，我們不必說得太远，就以近百年的画家來說，吳昌碩以篆法作画，喜用重色（大紅、大綠、赭、墨等），所作牡丹、菊花、紫藤、葫芦等等，具有一种古香冷艳、渾厚朴茂的独特风格。而白石老人，則又在青藤（徐渭）、八大（朱耷）、石濤和吳昌碩等人的基础上，推陈出新，为





是需要有“术”的，也就是说，需要有关于那件事情的具体知识，关于处理那件事情的科学技术。

取利防害问题，归根到底是一个认识客观规律、利用客观规律的问题。正确地认识了客观规律，学会了以完备的知识利用客观规律，就能取利防害。当然，正确认识和利用

自然景色传神写照，所作牡丹、紫藤、荷花、芭蕉等，独呈质朴浑厚，疏朗清新的风格。白石老人一样善用重色，但又独辟蹊径，不再走吴昌硕沉厚浓艳的路子，而出之以疏爽自然，特别是他所作的蝌蚪、青蛙、虾、大蟹、小鸡等小动物，生意盎然，神韵独造。

建立自己的独特的艺术风格，对于一个作家、艺术家来说，是十分重要的事。别林斯基说，风格“就是思想本身”，就是“思想底浮雕性、可感触性”。没有自己的鲜明的风格，首先就意味着没有作者自己对于生活、对于现实的独特的见解和深刻的感受，没有妙手匠心的艺术构思和艺术手法，这在思想内容上往往容易流于肤浅，在艺术上则往往容易流于单调。这样的作品，是不能很好地打动人、感染人的。

艺术风格的独特性不是艺术风格的单一性。我们常常说某位作家、艺术家的独特风格如何如何，这是就其全部作品风格的总的倾向、总的特色而言的，并不是说他的任何一个作品都是千篇一律地具有同一的风格特色。布封说过：“一个大作家绝不能有一颗印章，在不同的作品上都盖着同一的印章，这

用新冒出来的事物的规律，需要一个实践过程，要想一下子做到，那是不可能的。这就要求我们，在处理这类事物的时候特别谨慎，逐步地探索着前进，在实践中取得经验，善于运用马克思主义去及时地总结经验；这样，新冒出来的事物的规律，就能较早地为我们正确认识和利用。

就暴露出天才的缺乏”<sup>①</sup>。由于缺乏艺术才能而产生的艺术上的单调贫乏、千篇一律，与具有卓越的艺术才能的作家、艺术家具有自己的独特风格的情况，是应该严格区分的。任何一个杰出的作家、艺术家，他一方面有自己的独特风格，但他的风格又总是比较丰富多采、比较多样化的。

艺术风格的多样性、丰富性，与驳杂不纯又完全是两回事。前者是作家、艺术家艺术才能丰富和成熟的标志，后者则是作家、艺术家缺乏才能或艺术上还不够成熟的表现。这种驳杂不纯表现在一个作品中，就说明这个作品在艺术风格上的不统一，不和谐；这种驳杂不纯表现在一个作家的身上，就说明这个作家的全部或大部分作品，缺少一种统一的共同风格特点，缺乏一种鲜明的、独特的艺术特色。

作家、艺术家的鲜明独特的艺术风格，为人们所普遍认识并借以区别于别的作家、艺术家的艺术风格，乃是这个作家、艺术家大部分作品的艺术风格的共同特点，而风格的

<sup>①</sup> 《布封文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14页。



多样性，則是他的不同作品的艺术風格的各自的特点。它們的关系是，在各个作品的独特的風格中，在不同程度上体现着这个作家的艺术風格的总的特色，而这个作家的艺术風格的总的特色，又在不同程度上包含在各个作品的独特的風格之中，这样就形成了作家艺术風格的既多样又統一的辯证关系。关于这一点，我們可以看一看李卜克內西对于馬克思的風格的分析。李卜克內西說：

如果布封底話对任何人都是对的，它对馬克思也如此：“風格即其人”——馬克思的風格就是馬克思自己。一个像他那样彻底忠实的人，一个就只知道崇拜真理的人，一个一当被說服某些道理并不正确，不管自己費了多少工夫才得到它們而又多么珍愛它們，便立刻把它們扔开的人，在他底作品中也必然会把他的本色显示出来。不会虛伪，不会假装和忸怩作态，他在著作中和在生活中一样，永远是本来面目。这是实在的，这样一个多方面的、广博的、多才多艺的人，他底風格是不能像資质較为简单狹窄的人那么統一，那么无变化甚至單調的。《資本論》的馬克思、《拿破侖第三政变記》的馬克思与《福格特先生》的馬克思，乃是三个不同的馬克思，可是在不同中他們还是同一的馬克思——在三位一体中仍然有一种統一——偉大人格的統一，这人格在不同的領域里不同地表现它自己，而又永远还是同一的人格。①

李卜克內西的这段話說明了馬克思的風格的独特性和多样性的矛盾統一的关系。

我們如果只承认作家、艺术家風格的独特性而不承认他的風格的多样性，容易导致

阻塞艺术个性和艺术才能的充分發揮，是不利于艺术創作的。我們如果只要求作家、艺术家艺术風格的多样性而不注意風格的統一性，不注意努力建立自己的独特的艺术風格，也会使作品在艺术性上流于瑣碎平庸。無論前者还是后者，都不利于我們在文艺創作中探索和形成自己的風格。

我国历史上許多偉大的作家和艺术家，不但各具自己独特的艺术風格，而且在不同的作品中又都具有丰富多采的風格特色，前面提到的屈原和司馬迁，就是这样的作家。优秀的文艺批評家刘勰，不仅看到了屈原艺术風格的独特性，而且还看到了它的多样性和丰富性。他在《文心雕龙·辨騷》篇里說：“騷經九章，朗丽以哀志；九歌九辯，綺靡以伤情；远游天間，瓊詭而惠巧；招魂招隱，耀艳而深华。”\* 这里所說的“朗丽”、“綺靡”、“瓊詭”、“耀艳”等等，就具体地指出了屈原不同作品的不同風格。刘勰对屈原作品風格的分析，未必都很恰当，但对我們認識屈原作品的艺术特色，无疑是有好处的。司馬迁也是一位在風格上丰富多采的作家，他所作的許多人物傳記，几乎每一篇都有不同的風格。例如他写《項羽本記》，則雄勇猛健；写《孔子世家》，則典重温雅；写《屈原列傳》，則抑怨憤激；写《刺客列傳》，則激烈慷慨。

\* 刘勰多有把不是屈原的作品，誤认为是屈原的。如《九辯》是宋玉的作品，《远游》不知为誰所作，《招隱》則是淮南王刘安的食客所作。

① 保尔·拉法格、威廉·李卜克內西：《回忆馬克思》，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98頁。



司馬迁的作品的風格，确实是丰富多采的。

一个作家、艺术家的艺术風格为什么会具有多样性，这是值得我們探討的問題。我认为：第一，杰出的作家、艺术家的思想常常是丰富的，他們的个性和艺术兴趣，常常是多方面的，而且愈是偉大的作家、艺术家，他的艺术才能也一定愈丰富多采。思想、个性和艺术兴趣，是作家、艺术家艺术風格的决定性的因素，因此在他的創作中也就必然会呈现出艺术風格的多样性来。当然，有些作家、艺术家，由于思想和艺术才能不够丰富，因之他的艺术風格没有什么变化；另外，有些作家、艺术家，虽然具有較高的才能，但是由于他的生活或其他条件的限制，因而也不能使他的作品具有丰富多采的艺术風格。这种情况，自然是存在的，需要作具体的分析。第二，作家、艺术家的生活和思想、审美观点和艺术趣味总是不断地在变化发展的，这种变化和发展，不可能不影响到他的艺术風格。例如：南北朝时期的庾信，当他在侍梁昭明太子东宮讲讀的时期，出入禁闕，恩礼甚重，过着极其得意豪奢的生活，这时南朝又正在盛行着宫体詩，他在这种情况下，就写出了風格“綺艳”的作品来；但到他北去以后，故国淪亡了，自己从此开始过着羈旅北国的生活，在这样重大的变化下，他的生活和思想感情，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因之，他的艺术風格，也就随之而发生了变化。所以杜甫說：“庾信文章老更成，凌云健笔意纵横。”（《戏为六絕句》）又說：“庾信平生最蕭瑟，暮年詩賦动江关。”（《咏怀古迹》五首之一）杜甫在这

里称赞的，正是庾信的思想内容和艺术風格发生了很大变化以后的作品。在文学史上，由于作家、艺术家思想前后发生了不同的变化因而作品的風格也有所变化甚而至于有很大变化的情况，是屡見不鮮的。第三，作品的風格，一方面受作家、艺术家的思想、审美观点和艺术趣味等的决定性的影响，另一方面，又与作品本身的内容有密切的联系。作品的内容，对作品的風格也起着积极的作用。越是优秀的作家、艺术家，就越是善于使自己的艺术描写手段，适应于描写的对象。这样，他們的艺术風格，也就显得丰富而多采。清代的吳見思曾經說：“史公（指司馬迁——引者）遇一种題，便成一种文字，所以独雄千古。”（《史記論文》）由于司馬迁善于根据不同的題材来进行具体描写，他的艺术風格，也就如姚祖恩所說的达到了“洗洋瑋丽，无奇不备”的程度。

可見，一个作家、艺术家的艺术風格的多样性，不仅是他們在探索自己的独特風格的过程中所需要的，而且也是他們在形成了自己的独特風格之后也仍然孜孜不倦地着意追求的；不仅是作家、艺术家本身所追求的，而且是客观要求所决定的。今天，我們的作家、艺术家有的已經形成自己的艺术風格，有的仍在探索；为了更好地反映我們丰富多采的生活，我們需要更多具有風格的独创性和多样性的作家、艺术家。在这方面，前人的經驗中有許多有益的东西，可以供我們吸取，但更重要的是我們的作家、艺术家要通过自己的生活实践和創作实践进行創造性的工作。

